

旧资料 新标杆

——评《姬堂晋墓》整理理念与学术贡献

唐博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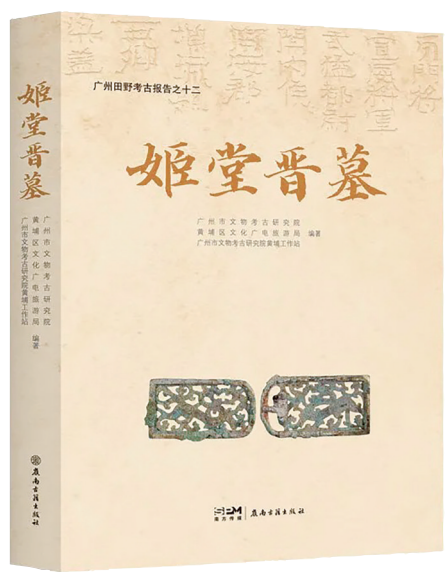
姬堂晋墓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姬堂社区居民委员会彭山北坡，长期以“姬堂晋墓”之名为学界所熟知。1994年，广州市在基本建设过程中发现并遭到破坏，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今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随即于同年6月、11月及1998年7月分三次对M1、M2、M3、M4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资料整理与报告编写工作在2023年重启。2025年《姬堂晋墓》终于面世。该书是姬堂晋墓考古工作最为全面的展示，是广东六朝考古领域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

该书体例严谨，内容翔实。除却序言和后记外，主体部分包括概述、墓葬与遗物综述、一号墓、二号墓、三号墓、四号墓和结语，后有附表和附录。行文以墓葬编号为单位，逐一介绍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结语部分对墓葬年代、墓地性质与墓葬等级、丧葬习俗、手工业问题、墓葬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在附表、附录中，出土珠饰化学成分分析、出土与采集陶瓷片物理化学测试和木质遗物的材质分析体现了姬堂晋墓多学科考古的重要应用。“麦英豪对M3出土金属器的处理意见”和“拆砖日记中手绘标本砖线图”的纳入已然成为姬堂晋墓学术史的一部分。值得称道的是，大量器物照片的运用使得读者获得了极佳的观感，尤其是器物微观信息的保留，充分体现了整理者和拍照者对器物细节的把控，极大地丰富了文字内涵。

此外，正文采用大量发掘现场照片，很好地弥补了发掘资料（M1、M2线图）缺失问题，这一策略是非常成功的，使得墓葬形制的细节特征得以有效保留，这些照片的保存和使用无疑是弥足珍贵的。当然，这也为考古工作者在资料的记录和保存等方面提出了警醒，在利用多重记录手段，增加照片、视频的拍摄与存储的同时，更要加大资料保存力度。

尽管发掘者在后记中特别强调“因发掘资料不全，所以并没有冠以‘考古报告’四个字”，但从其完备的编写体例、严谨的逻辑和系统的资料公布来看，《姬堂晋墓》已然是一部具备完整性和规范性的考古发掘报告。姬堂晋墓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为百年以来广东六朝考古提供了最典型的年代标尺。

广东六朝考古工作发轫较早，可追溯到1928年商承祚对广州员村晋墓的调查工作和1931年黄化考古学院的胡肇椿对广州西郊大刀山晋墓进行的科学考古发掘，以上两次工作使得岭南成为中国最早进行六朝考古的工作地之一。1949年以来，广东六朝考古工作伴随着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作次开展，已公布清理六朝墓葬约600座，尚有大量未发表材料藏于省、市、县博物馆之中。与其他省份相比，广东六朝墓葬缺乏更为可靠的墓志、买地券等准确纪年材料，不得不依靠纪年砖信息，使得纪年砖墓成为广东六



朝墓葬年代判断最为重要的依据之一。目前可统计的纪年砖墓仅有50余座，而西晋纪年砖墓约10座，主要分布在韶关、广州两地，其中，墓葬保存相对完整、随葬器物丰富的仅有广州皇帝岗M31（永嘉三年）、桂花岗M5（永嘉五年）、孖岗“永嘉七年”墓、沙河顶“太熙元年”墓（年代尚有争议）、乳源菜山II M11（元康元年）、III M2（元康五年）等少数墓葬。

非常幸运的是姬堂晋墓M1、M2不仅有清晰的“永嘉元年”（307年）纪年砖，还随葬有丰富的器物，其中M2出土的灶（M2：11）、瓷六耳罐（M2：4）、印纹壶（M2：5）等器物未见或少见于以往的发现。这批资料极大丰富了西晋时期广东的器物组合关系。

此批材料为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广州沙河顶“太熙元年”墓的年代问题提供了关键比照。沙河顶“太熙元年”墓因砖文模糊，器类特征缺乏有效对比，从而形成了西晋、东晋两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姬堂晋墓M2出土的青瓷罐、碗、盅、簋、耳杯托盘以及陶灶、灯等模型明器与之为最接近，因此，将沙河顶“太熙元年”墓定为西晋时期更具说服力。

姬堂晋墓在墓葬形制上展现出了多元的特征，对重新审视广东六朝时期墓葬形制演变具有重要意义。该批墓葬在年代相近的同一墓区内出现了长方形墓（M1）、中字形墓（M2）和中字形带耳室墓（M3）三种，其中中字形墓及中字形带耳室墓可以看作是广东东汉墓的延续，而M1所见的长方形墓是目前所见广东六朝时期最早的，很可能是受到长江流域影响，与墓主的身分、社会背景等有密切关系。

广东两晋墓葬中能明确身份信息的不多，

M3墓出土的“牙门将宣威将军武猛都尉关内侯”铭牌，这是继广州流花桥72北牌M002（大兴二年）出土“部曲都印”印、龙生冈53东龙M030（东晋）出土“部曲将印”印、韶关医疗器械厂“隆和元年”墓“弘乡亭侯”印和肇庆坪石岗秦宁三年墓“苍梧广信侯”墓砖后又一重要材料公布，为研究两晋时期广东的职官、爵制及军事组织在地方社会的实施情况，以及探讨广东“晋制”及葬仪等级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

报告成就显著，然在细节处理与结论推敲上，仍有可商榷之处。

关于出土遗物的分类。执笔者将各类器型依材质将陶模型器、日用陶器同时与青瓷器、金银器、铜器并列的划分明显不妥，应首先统归于“陶器”大类之下，再按照功能划分为“模型器”与“日用器”。如此，更具有层次性和系统性。

关于M3的年代判断。报告将M3年代定为西晋早期，主要依据是墓葬形制延续了东汉后期特征，且部分器物与M1、M2有诸多相似之处，并指出M1所出青瓷盆、洗可能模仿了M3铜器，加之M3铜镜具有孙吴西晋特征。然而，此论断或可再议。从墓葬结构上看，中字形带耳室砖室墓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期存在，可延续至东晋时期，如沙河顶“元熙元年”墓、佛冈民安晋墓、肇庆坪石岗东晋墓等。从器物类型学上看，M3出土了关键器物——青瓷大碗（M3：38），其特征与M1：采15、M2：采5两件大碗（口径在10厘米以上）有明显区别，M3：38口沿下方有一道粗凹弦纹，而M1：采15和M2：采5则饰有多道凹弦纹。参照广东地区已发表的纪年砖墓材料，口沿多条凹弦纹青瓷大碗见于西晋，如乳源菜山II M11、沙河顶“太熙元年”墓，而单道粗凹弦纹则仅见于东晋早期阶段，如韶关小茶山M13：14、肇庆坪石岗M1：24等、广州流花桥M2：2等。因此，结合器物演变序列，将M3的年代下限后移至东晋早期更为稳妥。

沉甸甸的《姬堂晋墓》为广东六朝考古建立了更为坚实的年代学支点，更以墓葬形制的多样性、器物组合的丰富性及墓主身份信息特殊性，深化了我们对两晋时期岭南地区社会文化、丧葬制度及南北文化交流的理解。

（作者单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姬堂晋墓》

编者：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黄埔文化广电旅游局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黄埔工作站

出版社：岭南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12月

双璧同辉：从《庙底沟与三里桥》到《三门峡庙底沟》

雷建鸽

《庙底沟与三里桥》中文版本的第一版出版于1959年9月。由于庙底沟遗址与三里桥遗址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上的重要地位，这部报告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80年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人类学教授波西尔和美国自然博物馆的瓦特·费尔赛维思博士，在征得当年发掘和考古报告编写的主持人安志敏先生同意后，合作翻译了《庙底沟与三里桥》一书，准备出版中英文双语版，并约请张光直先生写了序言。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直到2011年，这本书的中英文双语版才得以出版。出版时，仍采用了张光直先生在1980年为该书写的序言，并由陈星灿先生译成了中文。

张光直先生在序言中称：“《庙底沟与三里桥》，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陈星灿先生在后记中称：“《庙底沟与三里桥》是第二部被美国考古学家翻译的中国考古报告，至今还经常被人引用，其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价值毋庸赘述。”（第一部是《城子崖》）

在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发现的一期文化，属于仰仰中期的文化；二期文化，则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早期文化。在三门峡遗址发现的一期文化属于仰仰晚期的文化；二期文化，则属于典型的龙山文化。这两个重要发现，对于之前所谓的仰仰文化在西、龙山文化在东的二元对立说，起到了颠覆作用，并证明了：在河南地区，这是两种时间上相连续，是“经历了自身内在发展和变化的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前身”（张光直先生曾述）。而庙底沟二期文化，正是它们二者之间的过渡期和分界线。当时，我国一些专家学者如张光直、安志敏、石兴邦、许顺湛撰文提出，中国的史前文化不仅是土生土长的，而且是连续发展的。许顺湛先生称它们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两块“金字招牌”。这一结论，终于使似乎分割的、以大中原地区为主的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链条，得到了有机的连接。

以此为肇始，国内外考古界经过60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中华文明起源的腹地地区——豫西、晋南和关中的大中原地区发现了众多庙底沟类型的文化，从而使上述结论不仅成为公认的事实，而且，庙底沟文化，这种以农业



革命为动力的史前文化，如星星之火，其影响范围北达长城脚下，南抵江汉平原，东到海岱地区，西至甘陕，几乎传遍了大半个中国。这种文化在宗教、农业、礼仪、建筑、手工业、艺术、文字等诸多元素，已达到了文明发展的鼎盛时期，且延续不断，传承至今。

由于区划调整和城市发展的变化，今天的庙底沟遗址已经属于三门峡市区的一部分，三里桥遗址基本消失。所以，2002年5月到2003年10月进行的庙底沟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就以《三门峡庙底沟》命名。与第一次发掘报告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

发掘揭露面积大（第一次发掘揭露面积为4480平方米），地层关系丰富，出土文物类型多、数量多，不仅丰富了第一次发掘的内容，而且考古成果也更丰富。其中最主要的成果是发现了西王村文化。庙底沟遗址作为一处重要的仰仰文化类型遗址，不仅在中期特点鲜明，而且延续到仰仰文化晚期，具有延续性、发展性。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是其他世界文明所不具备的。这种

特性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魅力所在，在庙底沟遗址就是最好的佐证。

发掘出土的彩陶1500多件，为向公众宣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这些复原的彩陶先后在三门峡市博物馆、仰仰文化博物馆、庙底沟博物馆、山东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长沙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展出，不仅宣传了庙底沟，也宣传了三门峡。

出土不仅彩陶多，而且地层关系简单清晰。通过对不同地层出土文物和地层关系的分析，可清晰地划分时代脉络，看清文明发展趋势。该报告将考古发掘的地层信息详细记录并与出土文物对照，不仅延伸了庙底沟遗址的时间历史轴线，而且丰富了仰仰文化庙底沟同类型遗址的资料。

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彩陶以泥质黄褐陶、夹砂红褐陶为主。彩陶以钵、盆为主。陶器上多可以看出制作痕迹，部分石器也有红色的颜料痕迹。这些痕迹基本可以复原庙底沟遗址陶器的制作流程。这不仅体现出考古人的学科水平，更是研究庙底沟古人社会生活和制陶技术的实物资料。

“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三门峡庙底沟》同《庙底沟与三里桥》一样，“无疑将有助于把它置于世界考古经典之列”（张光直先生曾述）。

（作者单位：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

《三门峡庙底沟》

编者：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作为复旦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中华早期文明跨学科研究计划”书系之一，陈淳教授的新著《文明探源的理论与方法》近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在2007年《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基础上的修订与拓展，补充了近20年来中外文明探源的新进展。在中华文明探源工作持续推进、文明标准众说纷纭的当下，这本著作的出版恰逢其时——它试图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地探索文明的起源？

在2007年《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的序言中，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借用王国维有关中国学术三个时代的观点，提出我们当前仍处在吸收西方学术思想的“受动时代”，尚未进入“能动时代”。陈淳教授的工作，正是试图在这个“受动时代”里，呼吁中国学界将探源工作从编年史学转向科学研究，即在讨论物质文化标准和重建古史的同时，重视社会进化论与复杂化过程的范式转向。这需要重视高层次理论的建设，增强方法论的科学性与多学科整合，以及问题导向的信息提炼。

本书的意义在于，它既不是简单的中西比较，也不是照搬西方理论，而是试图“弥合中外学界在这个战略性课题上的隔阂，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一个参照系”。作者数十年来致力于将欧美考古学理论系统引进中国，从《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2003）到《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2016），从《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2007）到这本新著，还有诸多译著如《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和《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其学术追求一以贯之：推动中国考古学从材料整理走向理论阐释，从经验直觉走向科学实证。

《文明探源的理论与方法》全书除结语外共有六章。

第一章“概念与标准”梳理了文明的标准、概念和定义。在文明探源的课题上，“文明”这个术语一直有不同标准和定义的争论，陷入了观点不一和各执己见的困境。作为一项科学研究，概念是学术的基本单位，以便将研究对象转变为可观察之物。概念也是对事物的准确称呼，是理解的开始。文明探源必须在统一的定义下进行，当下国际学界普遍认可的“文明”标准是地域关系取代血缘关系与官僚政府和早期国家的形成。这不是个人立场与价值观之争，而是社会科学理性探索的共识。

第二章“认识论与方法论”认为，作为求知的理论，人类认识世界大体存在两种对立的认知途径。一是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它强调感官的认知作用。二是理性主义，它强调用逻辑推理来提供知识的可靠性。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与理性主义的认识论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论，前者凭借直觉、常识和经验的归纳，后者强调科学应该超越经验主义，将知识建立在可以验证的、有系统的“实证”基础之上。实证主义以理论为先导，探讨现象背后的潜能。所以，科学理论与实证主义方法密切相关。这章讨论了“二重证据法”与“三重证据法”的区别，并对社会思潮和价值观进行了思考，最后概述了20世纪下半叶考古学和历史学范式的转变。

第三章“进化论与理论的发展”讨论了社会进化论的发展，这是社会变迁的规律性或通则性探索，是文明探源的指导思想。我国文明探源主要囿于文献导向的证经补史，鲜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美国新进化论引入中国后出现了水土不服，认为其抽象概念无法与中国的考古发现对号入座。于是，有些学者弃用“酋邦”而代之以“古国时代”。但是诚如作者所言，由于中国考古学并没有自己的社会进化理论，所以“古国时代”与“酋邦”在概念和研究对象上无法相提并论。这需要我们深入了解社会发展规律与具体史实之间的区别。这一章还介绍了与社会进化论和等级制有别的另类视角——平序/异构，在关注社会纵向等级分化的同时，也要重视横向无等级的网络状复杂性。

第四章“文明与国家起源的主要理

本版责编：冯朝晖 丁淑娇 张 宸

MicroWise System

数智护文脉 元智赋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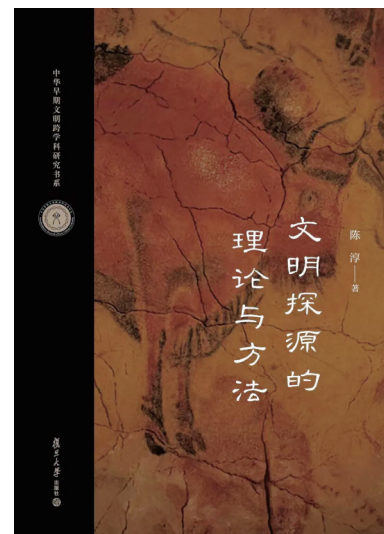
文化遗产全链数智解决方案提供商

<p>科技保护</p> <p>环境调控、环境监测、本体监测、健康监测、文物运输监测、文物展柜、文保修复实验室装备...</p>	<p>智慧管理</p> <p>藏品管理、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客流监测、数字资源管理...</p>	<p>智慧服务</p> <p>数字化采集、数字化展陈、智慧导览、咨询服务、展览风险评估、展柜气相评测服务...</p>
--	---	--

西安元智系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13572270596（张总） 座机：029-88246388
 邮箱：info@microwise-system.com
 网址：www.microwise-system.com
 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69号创业园E座4F

官方微信 官方网站



论”具体介绍了国家起源的几个重要理论，它们试图解释文明和国家起源的推动力。从这些介绍上可以看到，早期的理论基本上是单因论，将某种原因看作是文明起源的主动动力。单因论的缺点是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并有陷入某种决定论之虞。现在学界普遍认同文明起源的多因论，认为文明起源有一批重要的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文明之中，这些因素所起作用的相对重要性是不同的。于是，系统论就比较适合这种多因论的探索，将社会系统分为几个子系统，从这些子系统的互动和运转来探讨社会变迁的动力和原因。这种系统论解释还能够通过电脑模拟来加以检验。这一章后面还介绍了从线性发展转向网络关系，以及从比较视野了解多种政体发展路径的必要性。

第五章“社会复杂化与文明探源”从人口、聚落形态、手工业专门化、宗教艺术四个方面，讨论了考古研究如何从物质文化观察社会复杂化的文明进程。文明起源是社会逐渐复杂化的过程。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不仅要了解它们何时何地诞生，还要了解它们是如何从原始平等社会演变而来的。

过去许多用来定义文明的要素，如城市、冶金术和文字，都需要从其产生的背景中去考察它们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并分析它们的社会功能，这才是探源的关键所在。

第六章“方法互补与比较研究”提出，当下国际文明探源的趋势是注重将一般性与特殊性目标相结合的比较研究。这是因为学界认识到，单纯的通则性（理论）研究和特殊性（史学）总结都有其优缺点。通则性解释往往过于一般，而且从某个文明得出的规律性解释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文明。于是，学界开始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同时关注一般性的通则和特殊性的文化异同，以便更详细地了解各种社会文明化过程的多样性和不同路径。本章借鉴“秘鲁维鲁河谷”“古埃及”以及“二里头与夏文化”三个个案，比较了中外早期国家探源的考古学实践。结语部分对中华文明探源的现状作了思考，对迫切需要更新的一些关键概念和中国史学提出了建议。

这本书反思了中国史学传统的文明探源，认为它基本是一种经验和直觉研究，用张光直先生的话说，就是“利用史实的选择和描述来表达历史学家对价值系统的主观判断”。其缺点是没有理论指导；缺乏科学性；认识上依赖直觉，方法上依赖经验主义的归纳和总结。转向科学探索，我们需要克服传统方法的缺陷，学会用严谨的实证方法，以问题为导向，采取多学科交叉、通过各种证据链来进行逻辑推理，探究社会变迁的因果关系，用海量考古材料来重建中华文明的发展史。

《文明探源的理论与方法》根据国际学界的通行范式，为我们探索这个世界级议题提供了一个参照。它提醒我们，中华文明探源不必以证明文献的“信史”为最终目的，而是要重建古代社会如何生存、如何组织起来、如何从平等状态向国家社会演变的“整体史”。它也不是争夺民族主义话语权的自吹自擂，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张光直先生曾提出中国人文科学跻身世界主流的三个建议：跳出中国圈子，彻底了解学科主流的关键问题；了解研究中国的材料是否对全人类的问题有所贡献；用世界学者看得懂的语言把自己的贡献写出来。这本书就是朝这一方向努力的初步尝试。中华文明探源亟须社会进化理论的指导并提高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从材料整理走向理论阐释，从经验直觉走向科学推理，以便从“受动时代”走向“能动时代”，最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文明探源的理论与方法》

作者：陈淳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2月